

世界文学视域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季 进

回顾百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演进，我们都会认同一个共识，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有成就、最具特色的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诚如钱林森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再思》中所说，作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特色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研究层面的拓展，还是研究理论、方式的探讨，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西方比较文学界“学科之死”的喧嚣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彰显出其独特价值，拓展出中国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

最近三十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理念一再受到挑战。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在其《比较文学导论》中推崇翻译研究，宣称比较文学已经死亡，试图以翻译研究取代比较文学。2003年，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并非真的宣布比较文学学科之死，而是期待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的携手。2006年，巴斯奈特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放弃了原来对翻译研究的过度重视，转而提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她认为，“比较行为必须基于差异：文本、作家或文学运动的比较最好是跨越语言边界。”我们应该“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辩，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应该说，西方比较文学“危机”说或“死亡”说的背景是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与理论范式，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民族国家或国别文学的界定受到强烈的质疑，开始转而提倡超越民族国家或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开始走向世界文学的更高阶段。这也是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必急于宣称“当今世界比较文学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也不必急于建构中国式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或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而是有必要思考如何以世界文学视域来深化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对中国文学的隔膜，也许还有一点偏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中外文学关系展开跨文化的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正是中国比较文学大有可为之地。本来中国比较文学就处于非西方的文化语境，伴随着中国学术自身的现代性问题，

钱林森：《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再思》，载《跨文化对话》第24期。

[英]苏珊·巴斯奈特：《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黄德先译，载《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

最近宇文所安教授在与笔者的访谈《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中，也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为例，特别强调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参阅王向远：《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到了中国》，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与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有着明显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因此，陈跃红所说的“回到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始终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前提。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就是回到中国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的必然选择。

《跨文化对话》第24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圆桌笔谈已经就如何深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很有价值的见解。乐黛云先生强调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要着眼于“双向阐发”；严绍盪先生提出了“文学变异体”的研究，“文学变异体”表明了“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流动的文化本质；宋炳辉先生建构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理论层次或研究方法的三种可能；葛桂录先生强调了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的意义；王向远先生将中国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诗学”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相勾联；车槿山先生探讨了文本理论在文学关系研究中运用的潜在可能性；钱林森先生系统清理了“影响研究”的五种路径；周宁先生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第三种模式是“间性研究”，并具体提出了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三个层次。这些讨论，既有理论性，也有可操作性，是目前为止最集中、最有深度的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讨论，从理论层面，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虽然这些年来笔者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做“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但我无意也无力从理论层面再作深化，仅想谈谈自己粗浅的体会与感想。

首先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立足点的问题。传统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基本上沿续的是“影响——反应”模式，着力寻找作家作品中的外来影响，先有了某种外来影响，然后才有了作品的某种反应。这种研究模式最终的结果，无非是证明20世纪中国文学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发生、发展起来的。显然，这种研究模式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因素，没有主体的选择，没有中国语境的需求，何来这种影响呢？有感于此，陈思和先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命题，严绍盪先生提出了以“变异体”理论为核心的“文学的发生学研究”，这些都大大修正了传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单一性的弊端，丰富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维度。其实，“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与“变异体”理论，已经涉及到了世界文学视域问题，不再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而是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网络中加以考察，正如严先生所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管在什么层面上展开，“如果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文学或文化的世界性的历史联系没有知识，对作为‘对象’的文学或文化在人类总体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没有把握，他的一切的研究

陈跃红：《回到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载《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

最终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推进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可能要大大强化世界文学视域，消解 20 世纪中国文学过于鲜明的民族/国家印记，将其作为世界文学的一元，来综合考察两者的双向互动。世界文学视域应该成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立足点。

其次是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史料学问题。葛桂录所谈的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笔者是深有感触。如何通过大量史料的阅读与梳理，重建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现场，展现中外文学交流的原生态面貌，本来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可惜这方面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仍很不足。以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而论，1949 年以前的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梳理相对丰富，比如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陈思和主编的“世纪的回响”系列等都是非常扎实的史料梳理。相比而言，1949 年以后的中外文学关系史料梳理就乏善可陈，比如 1949 年以后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17 年文学”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可是只有查明建和谢天振的《中国 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从翻译史的角度作过梳理，少有从史料学的角度，整理两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再比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是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离开了外国文学，很难对先锋文学作出深入的评价，可是目前为止却没有见到系统的史料梳理。若想真正对 1949 年以后的中外文学关系进行深入的评价，首先必须整理出一份《中外文学关系系年》，对 1949 至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重要的研究论文、中国作家关于外国文学的论述等等，都按年月加以系年，并对重要作品与论文加以摘要介绍，以最原始而详实的资料，全面、清楚地显示外国文学翻译传播的成果与影响的轨迹，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最为坚实的基础。

再次是中外文学关系评析中的复杂性问题。我们仍以新时期文学为例，在具体的文学影响中，既有模仿，也有超越，只有充分考虑到两者关系的复杂性，才不会停留于简单的一对一的影响判断。马原、格非等人早期的创作，固然有其个人写作经验的偶然发掘，但更关键的还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的深刻影响基本上还停留于对外国文学叙事技巧的吸收与借鉴上。到了九十年代，新时期文学从某些臣服式的苍白模仿与借鉴，开始走向个人性的原创性写作。这种原创性写作并不意味着对外国文学的抛弃，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在叙事形态上借鉴了“辞典小说”的叙事文体，它或许来自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或许来自于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札尔辞典》，但这也仅仅是对韩少功起到了一种激发与点拨作用，只有《马桥词典》才将这种形式推向了极致，以完整的艺术构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艺术王国，也以

严绍盪：《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比较文学中的基础性学术》，载《跨文化对话》第 24 期。

民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为当代文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与艺术空间。如果说《马桥词典》与昆德拉、帕维奇还只是作品之间的借鉴与创新，那么在当代不少优秀作家中，更多的是一种创作主体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外国文学的吸收与超越。比如王安忆的创作中看不出外国文学的明显影响，但是外国文学经典其实已化作丰沛的汁液，涌动于她的血脉与生命之中，从而有可能使她的创作成为一个独创的“新天地”。对于这样的中外文学关系个案，就必须充分地细析两者的复杂性，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每一种文学都需要在与其他文学的正常交流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审美个性。尤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来临，随着全球化经济、信息技术、跨国资本、大众媒介的介入，我们面临着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相对主义时代，每一种文学都有着存在的合理性，我们更加无法超越于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而自拉自唱，外国文学与文化对中国文学来说，永远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他者。我们必须在与他者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中共同发展，形成和而不同、协调共生的众声喧哗的格局。20世纪中外关系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如巴斯奈特所说，“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从世界文学的视域，推动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总结中外文学交流的经验为己所用，从而全力发展自己的现代性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多元化承担起自身的那份责任。